



悦读周刊



找记者 上壹点

A07-08

齐鲁晚报

2020年9月27日
星期日

卓
然
于
心
悦
享
娱
乐

□ 美编：曲鹏红
□ 编辑：曲鹏红

刘震云是当代文坛重要的作家，随着《一地鸡毛》《手机》《我不是潘金莲》《我叫刘跃进》《一九四二》等电影的上映，亲自担任编剧的刘震云也与影视圈结下了缘分，这些影片也获得国内外多项电影编剧大奖。

2020“大师之光”青年编剧高级研习班于9月21日在济南市莱芜区开始了为期一周的交流学习，9月24日，刘震云围绕“从文学到电影”主题，对文学作品与电影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述。

刘震云：从文学到电影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 李睿

“我不是一个好编剧”

作家出身的刘震云，对文学创作、电影剧本创作之间的转换和异同有着深刻的感悟，待全员落座后，刘震云的第一句话是：“我不会写剧本，只能讲剧本创作失败的经验，将我的‘不懂’告诉大家。”

刘震云认为自己“是一个好作家，但不是一个好编剧”，他对文学作品和电影的异同做了阐述，认为小说重视人物的心理描写，可以用对白、陈述等方式直接地表达，但电影不可以；小说的容量是无限的，字数不受限制，所以其承载的内容无限，而电影绝大多数都会控制在120分钟以内，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故事结构和人物结构的起承转合，其承担的内容也注定要少一些。

针对创作者来说，小说是个体创作、一个人的写作，电影则是系统性的工程，需要多部门协作的工业流程。当习惯个体创作的作者加入到电影创作的系统性工程中，有时候会手足无措。

刘震云将小说比作大海，“表面的浪花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海水底部的涡流以及和日月星辰的关系；而电影像奔腾的河流，情节不断向前运动，其中会有瀑布飞落。”

如何写好一个故事？刘震云分享了自己凭借“数学好”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经历。刘震云很早参军，在戈壁滩上度过了多年的军旅生活，1977年恢复高考时，他选择参加高考，优异的数学成绩让他成为河南省高考状元，进入北大中文系就读。这也是他后来写小说写得好的原因，“我故事写得好，可能是因为我数学好。写故事就像做数学题一样，数学通过公式推导结果，故事也需要前因和后果的逻辑。”

当然文学作品不仅要结构好，更重要的是表达。“留住时代中那些珍贵的人和事，以及隐藏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情感”，这或许才是艺术的功能所在，也是文学和电影的相同之处。这也是从事文学和电影行业的目的，让这份珍贵可以冲破时空的限制，永葆青春地流传下去。

“独特的认识成就伟大”

刘震云认为，一个好的导演和编剧，首先应该是好的思想家，有对生活、对文学、对电影、对表演的独特认识，否则只是平庸的工作者，反之才有可能伟大。

刘震云用经典文学作品《红楼梦》和《水浒传》来举例。

《红楼梦》的伟大之处在于用“石头”和“草”比喻贾宝玉和林黛玉。林黛玉是一株绛珠草，是整个家族的外来人，她用“泪眼”看世界，整个《红楼梦》也是以“泪眼”的角度来看待世界；除了“泪眼”，小说中还有一个特殊的角色刘姥姥，刘姥姥从“贫穷”的角度看待四大家族，这也是很独特的视角。

《红楼梦》的伟大还在于它讨论了“干净”和“肮脏”的思辨关系，上升到了哲学角度。人性肮脏很多读者能看到，但《红楼梦》当中还有干净的“水”和“石头”——林黛玉的眼泪是水的结晶；贾宝玉这个石头，在小说中也不断地被水冲洗。

刘震云举例自己的小说《一句顶一万句》，他在写底层人民的心理时讲：所有下层劳动人民都不爱说话，话都藏在心里，万千心事汇成一股洪流。他认为，导演、编剧要以哲学思想和认识论思想来指导自己的创作。

在举例《水浒传》时，刘震云认为这本书的伟大在于，作者施耐庵用独特的链条式故事结构阐述了对整个大宋朝的认识。《水浒传》中展现了当时社会上的两套语言：朝堂的语言和江湖的语言。这两套语言支撑起了整本小说。

刘震云认为，林冲是《水浒传》中写得最好的人物。身为八十万禁军教头，和曾经的提辖鲁智深聊天时，两人都曾是朝堂之人，说的却是“江湖上的话”。而后被高衙内步步紧逼，自己步步退

却，直至被陷害发配沧州，风雪山神庙，大快人心，完成了人物性格的转折。因为林冲终于意识到当时他的处境是“你死我活”，所以手刃仇人，直奔梁山。

“如果施耐庵只写到这里，还谈不上伟大。他伟大的地方在于，林冲‘上梁山’之后的‘下梁山’。梁山老大王伦不敢接收林冲，于是以没有投名状为由，派两个小弟跟着林冲要亲眼看着林冲杀人。可是因为梁山周围的百姓知道路途凶险，大多是结伴而行，林冲没有机会下手。当终于发现一个落单的货郎时，林冲的反应是‘天佑我也’。”

刘震云说，这种“上梁山”和“下梁山”的结构设置，将林冲的人物经历和内心起伏展现得无比深刻。也通过林冲，让“朝堂之语”和“江湖之话”重叠转换，呈现了大宋畸形的状态。

刘震云还分享了在荷兰参加自己的新书交流会时的经历。一个读者告诉他，自己在读《我不是潘金莲》这本书的时候，笑到发疯，但主人公李雪莲对着一头牛倾诉的情节让她落泪。李雪莲为了一句话，花了20年的时间，依然没能纠正过来，还让自己的悲剧成了别人的笑料。只有牛是一直跟她在一起的，她觉得只有牛能相信自己说的话。李雪莲强烈的孤独感染了这位挪威的读者，除了牛，还有谁能相信李雪莲说的话呢？这位读者突然想到，还有这本小说的作者可以相信李雪莲的话，创作者就是这头“牛”，来倾听“李雪莲”的心事。

也就是说，文学和电影工作者，如果只有文学和电影的才华，是不够的，还需要有思想的才华。要能够准确捕捉那些隐藏起来、被忽略的人物情感，如果能捕捉并呈现这些常见却被忽视的人和情感，将会是一部很好的作品。

“作家成为好编剧不容易”

刘震云的作品最早被改编是1995年，那也是他和冯小刚初次合作。冯小刚根据刘震云的两个短篇小说《单位》和《一地鸡毛》，拍摄了电视剧《一地鸡毛》，由陈道明和徐帆主演，刘震云担任编剧。

这之后，刘震云相继担任了根据自己小说改编的电影《手机》《我叫刘跃进》《一九四二》《我不是潘金莲》以及《一句顶一万句》的编剧。关于文学、电影剧本、电影拍摄三者之间的不同，刘震云有直接的体会。在与冯小刚和张国立合作过程中，他发现小说中长段的台词放在电影剧本中大多是不合适的。

而小说对环境文学性的描写，在电影呈现上也会遇到问题。如在写《一九四二》的时候，刘震云写的是灾民的队伍前不见头后不见尾，这短短一句话需要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拍摄；在写《我不是潘金莲》的时候，李雪莲在牛棚与牛倾诉心事之后，最终决定还是要去告状，他的剧本是“一夜过去了”，用电影语言表现出李雪莲这一夜的心理历程，并不容易。

电影剧本中，对人物之间的纠葛状态往往是有强烈的要求。文学则不同，人物之间可以是很稀疏的关系。电影对文学的改编，最主要的是借鉴其故事结构、人物性格、创作角度，让电影观众和小说读者一样感受到故事中强烈的情感张力。

“我的小说其实都不适合改成电影，因为电影要求集中、清晰，而我的小说恰恰相反，杂而散，而且基本没有故事，这就会自动考量谁是特别好的导演。《一句顶一万句》写出来之后，有五六位一线导演都找过我，说希望改成电影，但是小说里有100多个人物，他们都问我，如何把这100多个人物装到一部120分钟时长的电影里？我认为，这是电影导演应该解决的问题。”刘震云表示。

“如果自己做不到，那就交给专业的人去做，并且相信他们。”他以话剧《一句顶一万句》的为例，十分肯定该剧导演牟森对于作品“众声喧哗”的理解，“有人说我的这部作品是讲孤独，其实我讲人们的勇敢，讲普通人的心事。”导演牟森在话剧《一句顶一万句》中引入了古希腊戏剧中的歌队，对此刘震云也颇为认可，“这是一种很有震撼力的戏剧形式，是讲心事的一种方法。”

